

奋斗者说

凌晨,大雨倾盆。供排水职工想尽一切办法,辗转在上班路上。“无论如何不能耽误生产”是他们的信念。必须尽快到岗的想法督促着他们与时间赛跑

雨再大也挡不住上岗的脚步

8月22日凌晨,一场暴雨突袭全市,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污水处理厂也不例外,近一米深的积水将急于奔赴岗位的部分职工拦在了路上,即便是这样,污水处理厂的各项工

作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不到6点,厂长王冰然在上班路上就开始布置工作:密切关

注厂内及周边的水情,听取各岗位情况,对有可能发生的突发状

况安排人员做好应急准备……副厂长郭淑屏边蹬车赶车边打电话督促各班组、各科室人员及早出发,告诫路远的职工选好交通工具,注意安全。运行中心主任曹国强安排运行人员全面做好交接班工作。有些职工被堵在路上,却一刻也不闲着,在群里实时报告路况,告诉大家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积水时如何保证人员和车辆安全等等。最

心香一瓣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事情,坚持了很久还是没有成功,这时候,往往就放弃了。殊不知,如果我们再咬牙坚持一下,也许就成功了!即使不成功,也要感谢不断努力的自己,因为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获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后成功道路上铺垫的基石

再多坚持一下

参加公司举办的掰手腕比赛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坚持,坚持住!正如裁判长顾顺利在鼓励选手时说的,谁多坚持一会儿,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坚持最久的选手才能获得冠军。

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朋友讲他在列车上遇到的一件事——列车售货员通过坚持,把水果卖给了我这位不太需要水果的朋友。

当时,一个售货员来到朋友身边,热情地告诉他,天气炎热,应该多吃些水果。朋友客气地表示不需要。售货员坚持说:“要一份吧!都是洗干净。”朋友还是告诉她不需要。售货员对朋友说:“真的很好吃,这里有青提、

红提、橙子等,选一样吧!”朋友说:“我刚吃完晚餐,真的吃不下。”售货员仍然热情地劝他买一点,他婉拒道:“谢谢,我真不需要,现在我斗地主的关键时刻!”听到这里,售货员更来劲了:“斗地主输赢很正常,吃点水果,调整一下状态,下局肯定赢!”朋友惊呆了,一般人被拒绝两三次就会放弃,但是这位售货员却不“不依不饶”,关键是语气可亲,一点儿都不令人厌恶,他有些被打动了。正当他犹豫之际,售货员说:“没关系,不着急,打完这一局再挑水果吧,我等你!”打完游戏,朋友放下手机挑了半天还是没有买,因为大多不是他想吃的水果,唯一感兴趣的橙子不好剥皮还粘手。朋友把想法告



时人心语

网络流行语为这个时代增添了些许色彩,注入了活力,也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乐趣。在时代中做一个独特的我,在流行中开一朵静雅的花,经典遇上流行,未尝不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经典遇上流行

在如今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更好表达?是用典雅优美的古诗文,还是选择鲜活新奇的流行语?当经典遇上流行,应该何去何从?

我没去过先秦,未见过古人,但我从《诗经》里看到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卫夫人,看到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出嫁新娘,窈窕淑女,就在眼前。我不是李白,抬头望月的一刻也会脱口而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没去过庐山,但透过“疑是银河落九天”感受到了庐山的壮美;我不是苏轼,但淡泊名利又会享受生活也是我的追求,每逢佳节,也总想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不仅是因为喜爱而做出的选择,还是我血脉中流传下来的典雅和洒脱,我爱它平仄仄仄,婉转悠扬的韵律,也爱它小桥流水,大漠孤烟的意象。

我属于当下,生于斯,长于斯。5G、元宇宙、自媒体、次、线上支付、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网络中自由穿行,我们的语言也悄然发生变化,新的网络词语层出不穷,紧跟时代,也肆无忌惮地彰显着这个时代。

我高兴时也会给友人发一个笑脸,还要露出两排牙齿;低沉时也会说出自己“emo”了。害怕时说“吓死宝宝”了,努力时不“躺平”,看到喜欢的人赞一句yyds。这就是网络时代的表达,符号也好,字母也罢,虽不委婉含蓄,但简洁而直白,快捷而方便,有时也不乏幽默风趣,随性

死心眼儿的回报

哲理故事

阿贾尔耶和辛格尔都是印度的耍蛇人。他们靠着每天在大街小巷表演维持生计。虽然他们的技艺高超,但还是会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为防止意外发生,慈善老实的阿贾尔耶时刻都把蛇药带在身边。辛格尔则不同,他害怕被毒蛇咬伤,又不想总带着蛇药。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先把毒蛇弄死,然后把蛇皮剥开,在里面填充质地柔软的海绵,中间则用铁丝支撑,他只需控制铁丝的一头,就可以操控“毒蛇”。

每次表演时,辛格尔的“毒蛇”就会乖乖扭动身子,他根本不用担心自己被咬伤,围观的人很难看出破绽,辛格尔就一直这么操作。相比之下,阿贾尔耶有些“死心眼儿”。他一直用各种活的毒蛇做表演,时不时就会被毒蛇咬伤。因为蛇药种类少,药效不够好,所以表演之余,他大力研究起蛇药。多年以后,阿贾尔耶研制出不少特效蛇药,成为一名医学家。他不仅救了很多



观的财富。而辛格尔,依旧是那个落魄的街头耍蛇人。

故事的哲理

失败源于应付

投机取巧解决当下的困境,就是透支事业的未来,仅仅为了短期利益,就会丢失长久的信誉。当下努力与否映射出未来,失败从来不是一瞬产生,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失去了“真”,就失去了持续创新的动力与空间。



家庭厨师

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即将来临。吃月饼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和睦。在此,分享一下广式月饼的制作方法,希望大家学习后能够自己制作月饼,与家人、朋友分享,共同度过一个祥和美满的节日

广式月饼的制作方法

原料:
糖浆、枧水、色拉油和面粉,根据自己的喜好备上五仁、豆沙等馅料。

工具:
烤箱、电动打蛋器、电子秤、毛刷、月饼模具等。

月饼配方:
糖浆 400 克,枧水 2 克,色拉油 150 克,面粉 500 克。

制作方法:

一、先将糖浆与枧水倒入盆中,用电动打蛋器搅拌 7 分钟,使之充分混合。

二、将色拉油缓缓加入糖浆中,一边倒入一边搅拌,搅拌约 3 分钟,然后静置半小时。

三、将糖浆、色拉油混合物继续搅拌 2 分钟,然后加入过筛后的面粉,用手将面粉揉匀,饧面 2 小时。



时人心语

网络流行语为这个时代增添了些许色彩,注入了活力,也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乐趣。在时代中做一个独特的我,在流行中开一朵静雅的花,经典遇上流行,未尝不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经典遇上流行

在如今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更好表达?是用典雅优美的古诗文,还是选择鲜活新奇的流行语?当经典遇上流行,应该何去何从?

我没去过先秦,未见过古人,但我从《诗经》里看到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卫夫人,看到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出嫁新娘,窈窕淑女,就在眼前。我不是李白,抬头望月的一刻也会脱口而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没去过庐山,但透过“疑是银河落九天”感受到了庐山的壮美;我不是苏轼,但淡泊名利又会享受生活也是我的追求,每逢佳节,也总想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不仅是因为喜爱而做出的选择,还是我血脉中流传下来的典雅和洒脱,我爱它平仄仄仄,婉转悠扬的韵律,也爱它小桥流水,大漠孤烟的意象。

我属于当下,生于斯,长于斯。5G、元宇宙、自媒体、次、线上支付、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网络中自由穿行,我们的语言也悄然发生变化,新的网络词语层出不穷,紧跟时代,也肆无忌惮地彰显着这个时代。

我高兴时也会给友人发一个笑脸,还要露出两排牙齿;低沉时也会说出自己“emo”了。害怕时说“吓死宝宝”了,努力时不“躺平”,看到喜欢的人赞一句yyds。这就是网络时代的表达,符号也好,字母也罢,虽不委婉含蓄,但简洁而直白,快捷而方便,有时也不乏幽默风趣,随性

企业核心价值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在身边



Yuan quan

2022 年 9 月 2 日
第三十二期
总第 583 期

主办: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 网址:www.gxqgps.com 准印证号:冀 L1100242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公司通过国家级综合标准化试点中期评估



8月25日,受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由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建的标准化评估小组对我公司承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进行了中期评估。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韩秀娟,

标准化科科长茆广辉,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管理处处长焦建军等列席。总经理林自强,副总经理周明等公司领导,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评估会议。

评估组通过检查公司的中

控室、水质化验室、一站式服务大厅,听取公司相关情况汇报,查阅试点工作记录、相关文件,按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实施细则》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评估计分表》,就公司的机构建立情况,标

准体系的统一性、完整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和询问,针对试点单位标准化建设实施情况,持续改进工作以及对相关方需求的效果测评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最终,专家组形成评估意见,我公司创建的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中期评估验收。

公司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始建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为确保标准化建设的贯彻实施,公司成立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总经理林自强任组长,主管标准化工作的副总经理任副组长,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统筹协调公司发展战略与标准化工作的方针、目标的有机统一,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and 有关强制性标准,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责任到人,扎实推进,整合内部资源,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为了在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产生共同效益,以规范、便民、高效为宗旨,在充分体现科学严谨原则的前提下,围绕提高群众满意度,坚持全员参与,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第七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精神,按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细则》要求,结合公司总体部署,围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和“用户放心满意,企业兴旺发达,个人心情舒畅,家庭幸福美满”的企业价值观,坚持以标准化管理为契机,不断完善服务标准体系,持续推进公司标准化建设进程,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服务中的支撑作用,坚持以用户满意为聚焦点,以推进标准化管理为手段,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持续推进企业提质增效。

(文/高阳 图/李彦兴)

本版责任编辑:刘彦芳

抗疫情承担社会责任 保民生彰显铁肩担当

周明

民生的铁肩担当。

牢固树立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的坚强决心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工作重点工作,提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具体要求。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的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中央和国家以及各级政府的要求,遵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疫情防控总要求,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深刻认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毫不动摇地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筑牢疫情防控屏障,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当前,全世界的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病毒不断变异,疫情不断蔓延,致使全球疫情处于高位,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因此,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持续面临着

较大压力,发生疫情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防控形势,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躺平”想法,不能有与党和国家疫情防控方针政策相悖的观念,不能有半点马虎和丝毫大意,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指示精神,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坚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人民群众生活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提升疫情防控效果。我国疫情防控形势远好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是用符合我国国情的防疫政策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珍惜、巩固和捍卫这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严防严控疫情蔓延是保障民生的重中之重

疫情发生近三年来,公司坚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党委、总经理林自强提出的“胸怀大局、关心他

人、保护自己、坚守岗位”疫情防控十六字方针,按照严防严控,毫不松懈,提高站位,万无一失的相关指示精神要求,逐步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力度,执行制度和措施不讲情面,对不控制制度和规定办事的人员坚决严肃处理,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较好成效。在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稳定职工队伍的同时,千方百计保障安全供水和污水达标排放,倾尽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供排水生产双胜利。

石家庄疫情暴发后,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党委书记、总经理林自强再次作出指示,企业上下一定要严防严控,确保关乎民生的供排水生产万无一失。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周明当即进行部署,遵照总经理林自强提出的疫情防控十六字方针和最新指示精神要求,在全公司范围内全方位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力度。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周密安排,科学、精准

地研判疫情,结合公司实际制订切实可行措施,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制订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格检查并强化落实,一抓到底,毫不手软。严格各厂区出入检测制度和消毒制度,配合每日全员核酸检测,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紧、抓实、抓细,真正做到抓执行、抓落地。全公司形成强大合力,提升疫情防控水平,增强疫情防控效能。加大宣传力度,监督和引导职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

暴发疫情的当天,公司应急防控工作已全部就位,做到全覆盖。抓关键、抓落实,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备齐了各种防疫物资,落实了各项生产保障措施,稳定了职工情绪。供水厂、污水处理厂、工程总公司等生产单位职工和相关处室工作人员基本到位,驻厂坚守,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守待命,后勤保障及时、有力。面对这次疫情,

(下转第二版)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新问题:解释中国经济起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做了系统回顾。2008年7月,年近百岁的诺奖得主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总结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经验的学术研讨会。是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08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为9.6%,虽比上年有所降低,但还是达到1978年以来30年平均增长率。次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过一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宣布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比照20世纪70年代末的情景,中国经济取得了足以傲人的成就。这也激发了学界总结中国经验的理论雄心。毕竟,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取得如此出色成绩,绝非偶然。与中国经济奇迹并存,应该有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建树。所以大抵也在2008年前后,人们不再满足于仅把中国作为验证现经济理论的一个案例,而立志要从中国经验里提炼新理论和新思想。其实经济成就与其理论总结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亦步亦趋。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之时,距瓦特发明第一台单动式蒸汽机不过七年,英国满打满算还处于产业革命的初级阶段。七十多年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超过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宏图,在当时还没有可能被人感知。斯密时代的英国经济并不超过经历了长久的缓慢增长,他当时看到过的绝大部分企业规模还很小,而不被他看好的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获皇家特许贸易权的大公司,为数寥寥。当时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普普通通,甚至乏善可陈。

正如那个一个经济基础之上,诞生了足以长久影响后世经济思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此作为参照,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就算斯密本人在世,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拿出与当今中国经济绩效旗鼓相当的思想产品,顺理成章。问题是雄心愈烈,挑战愈多。恰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虽然2009—2010年因施加强刺激政策而维系了高增长,但下行压力终究尾随而至。回头看,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折成高达15%的年增长率,应该是一个增长阶段结束的谷底绝响。不过几年光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减速一半以上。这里带出一个新问题,如何阐释中国经济的起落?分开来处理,可以增长奇迹速,下行析成因。但如果我们不满于此,希望在一个简明框架里获得对中国经济戏剧性变化一以贯之的理解,那就须付出努力。下文从一个核心概念入手,试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扩展相关分析。

二、体制成本的含义

这个概念就是“体制成本”。人们熟知“成本”,那是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要获得收益都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成本包括货币的、非货币的、时间的、精力和精神的,抽象出来作为谋求任何收益所必不可少的付出,构成经济行为最基

本的约束条件。可是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从事经济实务人士以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关注重点一直集中于生产成本,即为生产某物所不得不发生的各项支付。唯有当大规模生产伴随大规模交易的现代经济成形之后,生产成本以外的成本才开始引起注意。1937年,年轻学者科斯首先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本身并不免费。因为存在着正的交易成本,市场里就存在企业和多种多样的经济组织,虽然以往的经济学思维往往对此视而不见。这一朴素发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无独有偶,也很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在20世纪30年代从事抗战经济问题的研究时,也提出“纯商业费用”概念。他观察到当时湖南、江西等地的中国农民很穷,生产粮食的成本极低,但在沿海城市如宁波的粮食市场上,内地大米却竞争不过远道而来的泰国大米。经过仔细调查,张培刚发现从内地农村产地到沿海城市销地之间,经商成本过高是问题的关键,诸如地方割据、关卡需索无度及种种其他麻烦的顽固存在,把本来很有竞争力的内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场之外。他的结论是,如果有效改善商业通道,节约纯商业费用,战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得到改善。考虑到当时张培刚还不能读过上述科斯那篇论文,我们可以说一位中国学者独立发现了在生产成本之外还存在其他成本。这再次说明,当学者直面真实世界时,有机会提出一个新概念来阐释可观察到的反常现象。

经历多年沉寂之后,“交易成本”终于引起学界注意并得到进一步阐释。1969年,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他因此打通科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关系,因为在斯密那一代人那里,最关心经济体系的运行,而不是孤立而零碎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科斯的一些追随者则把交易成本概念扩展为“制度成本”。例如,张五常在1987年为《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撰写“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的词条时指出:“交易成本就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谈判、起草、实施合约,信誉和行使权力,监督管理的成本以及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当中的成本。”这是说,在直接生产之外需要付出的代价,还远不止狭义的交易成本。

在真实世界,制度无处不在。人们从事生产、消费、储蓄、投资等各项经济活动,无不受制于特定的产权与契约安排,无不组成特定的组织与机构,如家庭、社区、企业、市场、货币体系、立法、税收与政策制定、政府及一系列监管部门。这些交织到一起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不仅源于个人的自愿选择而自发生成,而且受到传统、流行观念与“社会强制力”的作用而被构建。

因此,为了在交易成本(或“纯商业费用”)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我们要把观察和分析的重点转向成体系的制度,特别要关注那些由社会强制实施的组织与制度怎样影响个人的选

择,并以此影响经济运行。

本文使用的体制成本,是指经济运行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体制由一系列制度构成,运行于由社会强制执行力的产权与契约的基础之上。举凡体制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体制成本的性质和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

与狭义的“交易成本”或“纯商业费用”相比,“体制成本”不但可以扩展到形形色色非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而且可以深化对市场及非市场行为的一般理解。人们习惯于把市场交易视为利益诱导下的自愿选择与契约组合,因此无须涉及那些带强制性性质、包括合法强制的力量与机制。“体制成本”则不同。作为真实世界里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集合,社会强制力包括流行观念、政府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制度禁止或许可,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要件。对体制成本的观察和分歧,涉及国家行为,离不开国家理论。与“制度成本”相比,“体制成本”更强调成体系的制度而非单一的、个别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把重点放到约束着自发自愿行为的社会强制力本身的约束条件存在,把本来很有竞争力的内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场之外。他的结论是,如果有效改善商业通道,节约纯商业费用,战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得到改善。考虑到当时张培刚还不能读过上述科斯那篇论文,我们可以说一位中国学者独立发现了在生产成本之外还存在其他成本。这再次说明,当学者直面真实世界时,有机会提出一个新概念来阐释可观察到的反常现象。

三、大幅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奇迹的奥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远的不提,1980年中国制订1981—1985年计划(即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确立下的年平均增长目标不过只是4%,“争取达到5%”。为什么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点时段的中国,定下那么一个事后看起来低估自己潜力的增长目标呢?因为当时中国经济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最大问题是在当时这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度,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非常贫困,无从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那么,为什么农业拖腿、农民贫穷?答案就是存在严重的体制障碍:不论政府多么急切地希望发展农业,也无法打开鼓励农业增产的阀门。

是的,并非单项制度或单项政策,而是成体系的、彼此纠缠到一起的观念、制度安排和政策首先,共同导向此困境团。这里首先是人民公社生产制度,集体出工、集体劳动、集体分配,虽享有一定规模经济的好处,但因难以准确计量个别社员的付出与贡献,从而难以调动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不仅如此,那种集体生产模式还常常因错误指挥和武断命令而遭受严重损失。其次,农村土地的集体公有一旦建立,似乎就再也不需要也不允许在农民家庭之间划出必要的土地产权界限。再次是农产品统购统销,由政府全盘管制农产品流通,政府一价定价定量收购,一手量定一手价在城市配给,基本排除市场机能。最后,为了维系农产品生产,国家禁止农民外流,不得自由转入收入较高的非农业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数量充沛的生产要素也无济于事。劳动力不能自动转化为生产力,竟能不能把潜在的成本优势发挥出来,受制于特定的体制,并非由所谓自然禀赋就可以决定。中国经验教育我们认识到上述区别。早在贸易数据惊醒世界之前,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人口大国,中国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似乎意味着她拥有极富竞争力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在事实上,如果被贫穷包围的巨量人口和劳动力,根本没有被投入有效生产,也提供不出能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产品,那就谈不到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比较优势。那些妨碍充沛人力资源投入生产过程的体制性摩擦,甚至高到足以让很多生产活动根本无从发生——这与物理世界里摩擦系数过高,物体根本就不可能被移动的道理,如出一辙。

无须强调,潜在的低生产成本从来不会自动生成比较优势。关键是谁能消除妨碍生产活动的体制障碍。不幸的是,潜在超低的生



2008年7月,时年97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自费发起并组织了一场“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受科斯教授指定,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会上宣读了题为《邓小平做了什么?》的论文。在文中,周其仁总结了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指出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把企业家请回中国,以及重新认识看不见的

庞大人口不但带不来红利,反而成为包袱,最后导致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出台。

按照传统分析,生产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较低的生产产品价格,从而激发需求增加,转过来拉动供给。但此分析忽略了一点:过高的体制成本妨碍要素的有效组合,从而限制产出增加,结果就在农业生产要素极其充裕的条件下,农产品却长期供不应求。于是,低农业生产成本——它的另一面就是农民贫穷——与农产品短缺长期并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克服的瓶颈。这说明,需要对体制成本做出恰当分析,才能理解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那些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

中国解决上述难题是靠体制改革。由于制度障碍并非孤立个别,而是自成一套体系,破解之道就是必须多管齐下。当时先实施的治标政策是养休生息:政府动用极为稀缺的外汇,增加进口粮食以减少征购量,让农民荷过重的农业、农民和农村缓一口气。接着政府又动用财政资源——当时要靠赤字维持——提升超额出售农产品的收购价,在边际上增加农民增产的激励。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尊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务实哲学,鼓励地方、基层和农民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大胆改革创新。特别是当安徽、四川等省区自下而上冒出来包产到户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给予底层自发改革以合法化承认。结果,仅仅几年时间,在农业生产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中国农业从生产、流通、分配到土地产权制度,渐进而又全盆地推进了改革。

概括概括,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即体制成本,经由改革得到大幅度降低。在农村变革进程中,降低体制成本的行为主体,首先是农户和基层社队,因为改革重新划定了集体经济产权的边界,使第一线劳动者有权运用自己的改革政策制定过程中,最终完成对改革的合法性背书。

很清楚,被历史短缺和农民贫困逼出来的改革,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才打开了充分释放原本数量充裕的农业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空间。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支持了国民经济增长。回头看历史检验了以下结论:农村改革这场奠基礼,突破了1981—1986年中国经济原先计划“保四争五”的格局,为后来中国经济更高速度增长创造了条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明白,中国并

手这三点,是中国经济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关键。他说,中国的基本经验就是经由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然而,十四年过去了,转型中国没有形成持续约束体制成本增长的有效机制。这是渐进改革远没有到位的表现,也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在本文中,周其仁指出,伴随高速增长经济

不需要把八亿农民束缚在农业和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业产业和城镇部门,构成中国高速增长的基础。不过,这该经济潜力的释放要求突破更为严重的体制障碍,包括对从事工业和城镇经济活动的国家垄断,也包括对非公经济包括个体户、私人合伙以及民营企业雇工经营的法律禁止。

给定那个时代背景,这两大障碍比承认农家家庭经营更难予以接受,再完成改革的全局合法化。大体到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思想政治方面的反复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得以确立。

四、比较优势新内涵

更大挑战接踵而至。中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务工经商生产力,到底哪里去寻找容纳得了它们的市场?出路是融入全球化。首先是借力发达经济体的市场。这也是从实际出发的选择,因为日后凸显的中国制造能力并非内生而成,从一开始,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商业模式,就参与与中国制造能力的形成。后来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靠全球市场消化自己惊人庞大的生产力,合乎逻辑。贸易数据让人们对新到来的经济大时代印象深刻。1978年中国出口不足100亿美元,到2012年超过2万亿美元,增长了210倍;进口从108亿到1.8万亿美元,增长160倍;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到3.3万亿美元,增长近2万亿。不过,要深入理解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非易事。通常看法,经济学上历久弥新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该是分析中国经济崛起最合适的分析框架。问题是,比较优势理论要获得用武之地,需要一个必不可缺的前提,那就是在发达国与后进国之间存在大规模贸易。问题是,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潜在的比较优势才被唤醒并受到强力激发?

为此需要明确比较优势的内涵。比较优势首先是比较成本,因为各个经济体——从个人、家庭、地方到国家——从事生产所花费的成本各不相同,其产品一旦进入市场,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在比较中互动,才形成主体优于或胜诸对手不复生存?至于颠覆苏联的“举国体制”,在笔者看来也未点中要害——究竟是举国抬高体制运行成本,还是举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本文认为,真实的中国经济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为理解和阐

释中国经验,有必要扩展比较优势的内涵,把生产成本与体制成本一并纳入分析框架。

五、成本曲线先后升降

体制成本也是成本,终究服从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学理论上,所有成本曲线一律先降后升。所以如此,传统解释的是边际收益递减。那是说,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在合理的要素投入范围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会在边际上带来产出增加,此时对应于产出规模,成本下降;但是过了合理临界点,增加某要素投入带来产出增量不增反减,于是成本曲线见底回升。

这套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生产成本的理解。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对一块农地追加劳力投入,会带来产出增加,追加肥料投入亦然。但过了技术合理临界点,过多劳力引起窝工,过多肥料烧死庄稼,农业产出的边际收益下降,成本曲线上扬。不过,此分析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便边际生产成本尚在下降,但随着规模扩大,是不是还可能发生其他成本?其他成本带来的产出效果又怎样变化?这个问题由科斯的发现得到解决,由于产品走向市场、走向消费者要发生非直接生产的服务费用——例如市场营销费用——该成本一旦过了交易结构的技术合理点,可能先于生产成本而上升。这与实际经验吻合,当较多的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即便其生产过程的边际收益还在上升,却很可能因为花费过多的市场营销费用而导致交易成本

的黑板经济逻辑所推导的,可能更早掉过头来重新上升。不过就算把生产与交易合并起来,也还不足以描述成本行为的全部。除了在生产交易过程中那些显而易见的耗费,譬如要不要多用劳力、加施化肥、引入机械、扩大厂房和设备、扩展营销等涉及收益考量的成本行为,在真实经济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还要支付一系列“非自愿耗费”,如不得不缴纳的税款和其他贡献,不得不耗时费力与管理部门或权力人物所打的交道,以及不得不在生产和市场过程中劳神费力和产品的与其他各方事关财务和利益的纠纷、冲突和损伤。虽然在不同经济体系里,自愿耗费与非自愿耗费的比例很不相同,但一般而言,它们普遍存在。遗憾的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现代主流经济学竟忽略了对其实世界里那些非自愿支付耗费的分析。中国的现实让我们格外关注体制成本。体制成本不是个别生产者、消费者或个别厂商在竞争中为获利所自愿支付的成本,而是成体系的、即使行为个体不自愿承担不可成本。这类体制成本具有强制缴

纳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可能比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上涨。

我们先看一组中国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12年间,中国名义GDP从60793.7亿元到518942.1亿元,共增长8.5倍。这显然是战后大国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不过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增长也必须付出代价即成本。对此,人们曾普遍关注,是不是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过我们发现,同期全国工资总

增长8.7倍,几乎与名义GDP增速持平,并没有特别快于经济总增长的出格表现。期间大大快于总是经济增长的,是以下几个变量:第一,税收,同期全国税收总额增长了16.7倍,相当于经济总量增长倍数的197%,或工资总额增长倍数的192%。第二,包括税后收益的财政收入,期间增长了18.8倍,快于税收增长。第三,全国社保缴纳,期间共增长28.7倍。第四,土地出让金,同期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增长了64倍。

以上诸项,都是为生产附加价值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不同之处在于,工资总额发生于劳力市场,包括绝大部分国企工人在内的全国劳力资源,通行劳务合同制,工资决定一般要根据雇佣双方意愿,受市场供求法则支配。但是,税收及其他向政府机构缴纳的行政服务费,属法定负担,带有执行方面的强制性,不存在个人、家庭和企业对政府行政服务满意就多付、不满意就少付的经济关系,而纳税方也难以参与税法制定和税率确定。持续改革退出体制,根本改善外贸服务,所有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几片无穷劳力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弥新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该是分析中国经济崛起最合适的分析框架。问题是,比较优势理论要获得用武之地,需要一个必不可缺的前提,那就是在发达国与后进国之间存在大规模贸易。问题是,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潜在的比较优势才被唤醒并受到强力激发?

为此需要明确比较优势的内涵。比较优势首先是比较成本,因为各个经济体——从个人、家庭、地方到国家——从事生产所花费的成本各不相同,其产品一旦进入市场,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在比较中互动,才形成主体优于或胜诸对手不复生存?至于颠覆苏联的“举国体制”,在笔者看来也未点中要害——究竟是举国抬高体制运行成本,还是举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本文认为,真实的中国经济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为理解和阐

释中国经验,有必要扩展比较优势的内涵,把生产成本与体制成本一并纳入分析框架。

体制成本也是成本,终究服从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学理论上,所有成本曲线一律先降后升。所以如此,传统解释的是边际收益递减。那是说,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在合理的要素投入范围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会在边际上带来产出增加,此时对应于产出规模,成本下降;但是过了合理临界点,增加某要素投入带来产出增量不增反减,于是成本曲线见底回升。

这套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生产成本的理解。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对一块农地追加劳力投入,会带来产出增加,追加肥料投入亦然。但过了技术合理临界点,过多劳力引起窝工,过多肥料烧死庄稼,农业产出的边际收益下降,成本曲线上扬。不过,此分析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便边际生产成本尚在下降,但随着规模扩大,是不是还可能发生其他成本?其他成本带来的产出效果又怎样变化?这个问题由科斯的发现得到解决,由于产品走向市场、走向消费者要发生非直接生产的服务费用——例如市场营销费用——该成本一旦过了交易结构的技术合理点,可能先于生产成本而上升。这与实际经验吻合,当较多的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即便其生产过程的边际收益还在上升,却很可能因为花费过多的市场营销费用而导致交易成本

的黑板经济逻辑所推导的,可能更早掉过头来重新上升。不过就算把生产与交易合并起来,也还不足以描述成本行为的全部。除了在生产交易过程中那些显而易见的耗费,譬如要不要多用劳力、加施化肥、引入机械、扩大厂房和设备、扩展营销等涉及收益考量的成本行为,在真实经济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还要支付一系列“非自愿耗费”,如不得不缴纳的税款和其他贡献,不得不耗时费力与管理部门或权力人物所打的交道,以及不得不在生产和市场过程中劳神费力和产品的与其他各方事关财务和利益的纠纷、冲突和损伤。虽然在不同经济体系里,自愿耗费与非自愿耗费的比例很不相同,但一般而言,它们普遍存在。遗憾的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现代主流经济学竟忽略了对其实世界里那些非自愿支付耗费的分析。中国的现实让我们格外关注体制成本。体制成本不是个别生产者、消费者或个别厂商在竞争中为获利所自愿支付的成本,而是成体系的、即使行为个体不自愿承担不可成本。这类体制成本具有强制缴

纳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可能比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上涨。

我们先看一组中国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12年间,中国名义GDP从60793.7亿元到518942.1亿元,共增长8.5倍。这显然是战后大国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不过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增长也必须付出代价即成本。对此,人们曾普遍关注,是不是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过我们发现,同期全国工资总

增长8.7倍,几乎与名义GDP增速持平,并没有特别快于经济总增长的出格表现。期间大大快于总是经济增长的,是以下几个变量:第一,税收,同期全国税收总额增长了16.7倍,相当于经济总量增长倍数的197%,或工资总额增长倍数的192%。第二,包括税后收益的财政收入,期间增长了18.8倍,快于税收增长。第三,全国社保缴纳,期间共增长28.7倍。第四,土地出让金,同期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增长了64倍。

以上诸项,都是为生产附加价值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不同之处在于,工资总额发生于劳力市场,包括绝大部分国企工人在内的全国劳力资源,通行劳务合同制,工资决定一般要根据雇佣双方意愿,受市场供求法则支配。但是,税收及其他向政府机构缴纳的行政服务费,属法定负担,带有执行方面的强制性,不存在个人、家庭和企业对政府行政服务满意就多付、不满意就少付的经济关系,而纳税方也难以参与税法制定和税率确定。持续改革退出体制,根本改善外贸服务,所有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归结起来,就是把先前几片无穷劳力的体制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同时也包弥新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该是分析中国经济崛起最合适的分析框架。问题是,比较优势理论要获得用武之地,需要一个必不可缺的前提,那就是在发达国与后进国之间存在大规模贸易。问题是,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潜在的比较优势才被唤醒并受到强力激发?

为此需要明确比较优势的内涵。比较优势首先是比较成本,因为各个经济体——从个人、家庭、地方到国家——从事生产所花费的成本各不相同,其产品一旦进入市场,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在比较中互动,才形成主体优于或胜诸对手不复生存?至于颠覆苏联的“举国体制”,在笔者看来也未点中要害——究竟是举国抬高体制运行成本,还是举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本文认为,真实的中国经济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为理解和阐

释中国经验,有必要扩展比较优势的内涵,把生产成本与体制成本一并纳入分析框架。

体制成本也是成本,终究服从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学理论上,所有成本曲线一律先降后升。所以如此,传统解释的是边际收益递减。那是说,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在合理的要素投入范围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会在边际上带来产出增加,此时对应于产出规模,成本下降;但是过了合理临界点,增加某要素投入带来产出增量不增反减,于是成本曲线见底回升。

这套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生产成本的理解。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对一块农地追加劳力投入,会带来产出增加,追加肥料投入亦然。但过了技术合理临界点,过多劳力引起窝工,过多肥料烧死庄稼,农业产出的边际收益下降,成本曲线上扬。不过,此分析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便边际生产成本尚在下降,但随着规模扩大,是不是还可能发生其他成本?其他成本带来的产出效果又怎样变化?这个问题由科斯的发现得到解决,由于产品走向市场、走向消费者要发生非直接生产的服务费用——例如市场营销费用——该成本一旦过了交易结构的技术合理点,可能先于生产成本而上升。这与实际经验吻合,当较多的农产品或工业产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即便其生产过程的边际收益还在上升,却很可能因为花费过多的市场营销费用而导致交易成本

的黑板经济逻辑所推导的,可能更早掉过头来重新上升。不过就算把生产与交易合并起来,也还不足以描述成本行为的全部。除了在生产交易过程中那些显而易见的耗费,譬如要不要多用劳力、加施化肥、引入机械、扩大厂房和设备、扩展营销等涉及收益考量的成本行为,在真实经济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还要支付一系列“非自愿耗费”,如不得不缴纳的税款和其他贡献,不得不耗时费力与管理部门或权力人物所打的交道,以及不得不在生产和市场过程中劳神费力和产品的与其他各方事关财务和利益的纠纷、冲突和损伤。虽然在不同经济体系里,自愿耗费与非自愿耗费的比例很不相同,但一般而言,它们普遍存在。遗憾的是,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现代主流经济学竟忽略了对其实世界里那些非自愿支付耗费的分析。中国的现实让我们格外关注体制成本。体制成本不是个别生产者、消费者或个别厂商在竞争中为获利所自愿支付的成本,而是成体系的、即使行为个体不自愿承担不可成本。这类体制成本具有强制缴

纳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可能比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上涨。

我们先看一组中国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12年间,中国名义GDP从60793.7亿元到518942.1亿元,共增长8.5倍。这显然是战后大国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不过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增长也必须付出代价即成本。对此,人们曾普遍关注,是不是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过我们发现,同期全国工资总

增长8.7倍,几乎与名义GDP增速持平,并没有特别快于经济总增长的出格表现。期间大大快于总是经济增长的,是以下几个变量:第一,税收,同期全国税收总额增长了16.7倍,相当于经济总量增长倍数的197%,或工资总额增长倍数的192%。第二,包括税后收益的财政收入,期间增长了18.8倍,快于税收增长。第三,全国社保缴纳,期间共增长28.7倍。第四,土地出让金,同期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增长了64倍。

说明,转型中国在取得高速增长成就的同时,尚没有形成持续约束体制成本增长的有效机制。这是渐进改革远没有到位的表现,也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比照早期以“解放思想、放权让利”为纲领的改革,随着中国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因发挥比较成本优势而实现高速增长,一度大幅降低的体制成本又重新掉头向上,并以远超高速增长

的更高速度回升。实际情形很像一匹巨型骆驼,早期减负促其奔跑,却在高速行进中不断被加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终于令其前行乏力。本文认为,对于一个迄今为止靠比较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的经济体,中国高速增长轨迹的变动,可用体制成本的下降和重新上升给予解释。

六、难以量化的体制摩擦

还有一些体制成本,难以在统计上得到反映。观察表明,经济活动中涉及产权关系、合同纠纷、新产品开发与相关市场准入、政府专营范围变动、行政诉讼和民事案件审理等事务,无一例外,都需要在直接生产成本之外另有所耗费。虽然这类广义的交易成本或本文定义的体制成本在一切所谓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也照样发生,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而言,这些非生产成本的形态还是颇具特色,自成一家。据笔者近年研究过的若干案例,本节简要讨论这类成本的性质。

还有一个案例涉及政府电信专营。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提供了完成语音通信的新机会。与传统电信不同,基于互联网的语音通信(IP电话)无须在通话时独占昂贵的电话电缆,而能够在同一线路上大量传输压缩了的语音数据包,从而可以革命性地降低通信资费。1997年年底,福州市马尾区一家由陈氏兄弟经营的民企开始把IP电话应用于商业活动,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当时中国的国际长途话费很贵,每分钟在18元至32元之谱,而陈氏兄弟提供的IP电话,每分钟收费仅6—9元,于是他们的生意火爆。但是,当地电信局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报案,由区公安局查封经营场所、扣押设备,并限制两兄弟人身自由,后由家属缴纳取保候审费5万元才予释放。陈氏兄弟到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败诉后又上诉至福州中院。福州中院院长许永东法官考虑到案件涉及新技术,要求各方提供专家证人,当庭辩论IP电话与传统电信在技术特征方面的差别。经过审理,福州中院认为IP电话不属于传统电信专营范围,而属于国务院文件规定的可以向社会开放经营的新业务。1999年1月20日,福州中院裁定,撤销马尾区法院对陈氏兄弟案的处理,发回区法院重审。

可惜,这份7000多字写就理据清晰的法院裁定,未得到应有尊重。1999年1月21日,也就是福州中院发布裁定的次日,信息产业部管理局一位处长对媒体公开宣称,“IP电话不属于电信专营”,“无从谈起”。他的根据,是信产部发过的一份“通知”,其中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业务”实行许可制度,“暂不开办电话、传真等电信业务”。这位处长说,既然明确“暂不开办”,如果有人利用IP电话经营长途电信业务,就是非法经营”。他还通报:“对于经营IP

出,这些有悖常理的不当行政管理,要保护的仅是邮政部门过时的专营特权,与防范病毒毒一点也不相干。

第三个案例是一档东莞奇事。作为沿海开放和中国制造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重镇,东莞市绝大多数常住人口非本地户籍,由此导致本地服务严重供不应求。新兴民企竞相进入,其中包括在街上开设药店。2002年3月,《广东省零售药店设置暂行规定》宣布开放广东药品零售市场,外地商家涌入东莞城里,民间投资热情高涨。然而,“他们很快在一道坚实的行政壁垒上碰得头破血流”——东莞市药监局从2001年6月开始施行“500米直线范围内不准开设第二家零售药店”的审批准则,到次年在与论和省领导干预下宣布撤销,“500米大限”整整实施了一年。在此过程中,很多花费了购租铺面、装修、进货、人工成本的投资方,因拿不到批件而不得开药店经营。因不通过审批的原因,是在500米距离之内,还有其他药店或药品专柜——其中包括某些后来先到的“关系户”。据说,当地药监局开着车用咪表“准确度量”,就算差上几米也不批准。其实在市场上开店是不小的学问,一万余米内只开一家也无从保证一定不赔钱,50米内开3家也不一定不盈利。究竟如何布局,谁投资谁操心,政府要监管的是不卖假药、不准欺诈。

上述几个案例,在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里似乎小到不足为道。不过深入案例,才清楚认识中国经济所遭遇体制摩擦的经济性质。很明白,在直接生产成本或直接服务成本之外,经济运行还要支付其他耗费。无论是陈氏兄弟被扣的官费、取保候审的“押金”以及为官司所付钱财和精神耗费,还是快递业务或医药零售业务为谋求合法排他所投入的努力,无一例外都属于本文所关注的体制成本。这些“额外”的代价,可以大到足以让许多商业活动根本无从发生。

也不要以为这几个案例发生在新世纪之初,随着时间展开,那些阻碍创新、抑制投资、干扰就业增加的体制成本就会自动降低。观察表明,新世纪初中国经济摆脱上一轮通缩新患走强之后,“宏观调控”压倒了“打破行政垄断”的改革部署,不当管制重重叠叠,行政审批愈演愈烈。

2012年新一届政府再次高呼“放权让利”,以此对经济下行压力,由此而来。新一届政府宣布要清理废除行政审批文件,多达成百上千,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的遗产,而是在新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行政部门左一项右一项加到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许可以作为体制成本居高不下间接证据:早在90年代就尝试开放的中国电信业,囿于仅对几家央企开放,通信网络的资源水平和服务质量虽有进步,但依然广受诟病,以至于到了2015年,还要国务院总理出面喊话,要求中国宽带必须降费提速。不过,涉及部门权力与利益,高层宣示未必能够做到自动落地。

七、食席和奢靡的经济影响

2008年7月,在提交给科斯的论文里,笔者曾指出,“在20世纪30年研讨会上的论文里,（下转第八版）”